

满族书面文学流变

关纪新 著

满学研究丛书 赵志强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满学研究丛书 赵志强 主编

满族书面文学流变

关纪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书面文学流变 / 关纪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6370 - 2

I. ①满… II. ①关… III. ①满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70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5
插 页 2
字 数 535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百年以来，种种的社会历史因由，形成了满学研究长期严重滞后的局面，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展开。其中的满族文学研究领域，在为数不多的学者殚精竭虑的开拓下，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令广大学界改变了对满族文学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状态。

随着一批老学者们相继逝世，更为深入研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身上。本书作者关纪新，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从大学三年级起，就十分注重搜寻清代满族作家的文献资料，打下了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以后一直埋头于满学研究，出版了不少学术专著，尤以《老舍评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等力作产生较大反响，遂被认为是当今满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年学者的领军者。此项“满族书面文学流变”课题，是他罹患眩晕症时，天天在眩晕难忍、摇摇晃晃、举步维艰的病态中，所做的重大选择。这一选择，不仅需要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顽疾所带来的痛苦，更需要具有极大的学术勇气。

研究探讨一个民族于 400 年间，运用母语与非母语所进行的书面创作的历史经验，是要有大气魄、大手笔，并须费大力气才能做的事情。纪新以恢弘开阔的学术视野、勇于担当学术史重任的坚毅气概以及顽强奋斗的意志，终于将厚达十三章的一本大书完成了。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秉笔直书，力透纸背，充分表现出敢为人先的胆识和难能可贵的激情，发出了前人所未发的论述，做出了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进而承前启后地将近 30 年来的满族文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部具有别样的深沉、别样的风格、现如今并不多见的满学新著。

在允诺为此书写序之时，我未曾想到，会写出如此赞许之语。但是，当接到书稿，于盛夏酷暑时节，远避在京北山区僻静之所，一章一章仔细阅读时，竟然像读到文学佳作那样，深受感染，三次为之落泪，两次拍案叫好！

这是一般学术著作不可能产生的效果，并非是出于偶然一时之冲动。三十多年中，与纪新亦师亦友，我能读懂这部书字里行间饱含的赤子深情，这书是他无所畏惧的拼命之作，是他用毕生研究之积累，为继承发扬本民族文化，所作的真诚、勇敢、执著的奉献。

最为难能的是，作者以敢于直面历史的严谨科学态度，突破学界长期存在的一言堂类型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纪新一直强调“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已然成为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内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极力主张“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他认为研究满族文学，必须立足于满族“始终是与中华主体民族汉族之间，存在近距离社会交流与文化互动”这一基本看法。然而，由于满族作为一个有过特殊历史遭际的民族，谈满族文学，特别是要谈“流变”，也就必然会面对辛亥“驱逐鞑虏”革命后，国人已经习惯了的思维定式。怎么去看有清一代近300年的满族文学？怎么认识100年来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满族文学？怎么评价用母语创作以及大量用汉语创作的满族文学？如此等等许多难题，均曾经被歪曲、误解，甚至在全社会集体无意识之下，被通盘否定。许多史料，或被“革命”抹去、或被集体失忆。进行学术研究，必须以史实说话，纪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虽然其生也晚，却在进入满学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尽心尽力地搜集着各种有关资料。

让我难以忘记的是，1983年至1984年那寒冷的冬天里，我们天天到北京市东城区柏林寺破庙里的北京图书馆临时书库，借阅那里长久被封存的清代满族作家的专集，在没有暖气的大殿里，我们烤着火炉，用纸笔小心翼翼地抄写着，因为已经发黄变脆的书页，稍不经心，就会破碎……最终，我们出版了第一部《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张菊玲、关纪新、李红雨辑注）。后来，他还独自整理、点校出版了《八旗艺文编目》。这些，均为完成这部近300年的古代满族书面文学研究的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纪新又主编（兼撰稿）了大型学术图集《中国满族》，用照片与文字对照的方式，总体展示出满族的历史、风情、文化、人物。他还不辞辛苦地通过大量采访、查询、约稿等繁复工作，主编了《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

这期间，他以强烈的责任心，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口述历史性质的采访工作，如他因家庭关系，知悉一些中共中央的老革命家所谈及满族问题的意见，他都一一记载在这部书的注释里。更多的是利用参加会议的间隙，通过

交谈了解到一些民国初年满人际遇的情况，例如著名教授唐圭璋的身世，大画家、“敦煌艺术守护神”常书鸿的幼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的家教，等等，也都先后被他采访到，做了记录。这些长者接踵去世，他们的资料，稍纵即逝，再难捕捉，纪新用心良苦，情深意切，将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保存下来，作为佐证，弥补史料的失阙。

而纪新如此大胆地秉笔直书，更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道。正因有了长期以来，从古到今的大量珍贵资料的积累，使他这部书中，在与曾被歪曲、误解的许多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论辩时，具有充分论据，产生强大说服力，使这部书的许多章节，别有新解，论点独特。

如第三章中，对纳兰性德的解读，就明显与历来学界观点不同。尤其是对于康熙朝满族文学第一轮辉煌中取得杰出成就的词人纳兰性德，“因何故‘惴惴有临履之忧’”，纪新凭借满民族形成过程的确凿史料，认为“不像此前诸多学者所言，完全是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间的宿怨”，而另从纳兰性德敏感的民族文化心态上，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指出：“脚踩两种文化，也就不能不‘惴惴有临履之忧’。这不光是纳兰性德当时的心绪，也是清朝统治者乃至满民族彼时共有的焦虑。”本书作者这种参凭历史大背景进行民族文化的反思，贯穿于叙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这部书的始终。

又如，对于晚清时期小说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学界颇有争议，针对种种指责批判，纪新有理有据地、用大篇幅详尽阐释了“它是首部直截了当、放开手笔地写满族社会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是一部清代文学史上通盘表现旗族生活场景无出其右的大制作”，“能够如实表现清代旗族自身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同时又能准确地展示出那个时代之旗民关系”，《儿女英雄传》的艺术特长“差不多具备了为大众喜闻乐见之评书艺术的一切要素”，“纯用京语白话写成，实是一道京白语体艺术的丰美大餐”等观点。与激进派批判评论全然不同，纪新回到文康从事创作的本源，以不苛求的态度，说明了这位处于末世的旗籍作家：“写得出来一部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小说，却又在思想层面上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新货色。”

历来，在学术史上，因时代不同、受到影响的思潮不同、研究者的身份不同，从而产生对待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见仁见智的评论，是常有的事，这里，纪新以其著作者的独立思考，从民族文化的角度，重新进行审视，提出他人难以反驳的新论，是可以成立的。

这部书，将400年来满族的书面文学流变，精心地设计成十三章，比较

科学地加以分别叙述，每一章都努力从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审美追求、民族心理特质等各个层面，进行剖析，不但“把满族文学真的从社会历史的重重遮蔽跟民族文化的深深误读之中搭救出来”，更为弘扬中华多民族的灿烂文化做出了新的开掘。全书涉及作家、作品之多，引用资料之丰富，已为以往满学研究所不多见。

其中对《红楼梦》和老舍作品的论述，更以罕见的新颖观点，成为这部书中不可不读的最精彩章节。

纪新明确指出：“不懂满学，您是很难研究透彻《红楼梦》的。”在他倾力写作第六章“经典复读——红楼梦醒托大荒”时，一次来电话，告诉我说：“要说《红楼》了，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真是在用‘心’来写！”现在，当我读到这部书最长的这一章节时，全然没想到他竟用了如此充满感情的笔触，向读者解说道：“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原本就具有一重特殊性，那本是一位由满族社会走出来的文学家，在书写一个在清代独特历史景况当中满洲豪门世家的故事。”纪新仍然是出自“参凭于历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仔细说明《红楼梦》“堪称是鲜活完整地描摹出了彼时满洲贵族生活的大千样况”；指出“从满洲的‘家奴’及‘家生子儿’现象，来重新梳理贾府发生的故事，来用心体察雪芹写书的初衷，与我们用一般的社会学、阶级论的方式来机械解读，结果怕是不尽一致”；又指出，“《红楼梦》借宝玉之口道出的男女性别观，是作者雪芹对满洲特殊性别理念的一次能动的归结与提升”；还举出种种事例，让读者充分了解，“雪芹隶属满洲，谙熟于满洲，并且是在丝丝入扣地写他的满洲故事”；介绍到主人公贾宝玉时，他更是异常动情，不拘论说文的体裁格局，以诗意般的散文风格写出长长一大篇文字，连用八次“那宝玉”，作为每段叙述的开头语，犹如行云流水一样，畅快淋漓地道出了：雪芹“陷于一种无可排解的民族历史文化幻灭感，将笔下所书各项悲剧线索彼此互构，皆由民族文化之折冲来解释。于是，他追觅，他痛悔，他反省，他彻悟……”最后，他不同意当今“红学”最流行的说法，陈述道：“笔者不能苟同的，是把雪芹和宝玉生硬地推到封建时代‘反叛’的位置上，却以为，把他和他的男主人公看成是一种充斥悲情的文化英雄，会更恰当些。”……如此一系列独特的议论之后，纪新谦虚地说，权只当作“发微于满学视角的一家之言”。而我相信，那是会引起红学界的重视与关注的。

自从进入满族文学研究领域起，纪新即开始潜心研究老舍，他深知“作

家老舍，是满族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发表过不少博得学界好评的学术研究成果著述与文章。在这部书里，有关老舍，依然是分量很重的章节。纪新深入挖掘着老舍的巨大成就，说：“历史延续到20世纪，挑中了京城旗族的后来人老舍，把他锤炼成这一既定传统的现代继承光大者；而长久以来，八旗下层官兵为艰辛生计折磨，也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在悲苦境遇之下讨取生活乐趣的习性，这为老舍笔下‘泪中含笑’的民族审美习惯，备下了社会与文化前提。”他高度评价：“《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是使老舍最终确定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借此重新发现老舍，老舍也因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庶民文学永不褪色的经典之作，与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共同托起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殿堂的巍峨拱顶。”而纪新对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创作的话剧《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更评之是“对满族文学史册呈上的无价瑰宝”。有关《茶馆》，他写了一段饱含凄苦之情的论述，字字血、声声泪，使我为之动容。这里不吝篇幅，全文录下：

让满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备受折磨的问题，大概莫过于自己的民族，被普遍地看成是个缺乏爱国精神、不乏卖国记录的民族。事实上，满民族从来就不曾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之外，“我是旗人，但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观念，在他们那里，历来都是从精神到言行的基本准绳。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负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这一番酸楚无比的话语，出于一位黑暗世道下面行将惨死的老旗人常四爷之口，字字句句蘸着血泪。它是旧中国满族民众凄苦之至的告白，更是满族文学巨匠老舍为自己那些亲近而又无助的同胞们，所留下的最切肤的体认和最真诚的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一个民族原本具备着与史俱来的爱国情愫，到头来，却要他的每一个成员背负“卖国”的弥天罪责，实为扬四海之波也洗不清的大冤枉。常四爷在告别人

生前夕已是万念俱灰，所耿耿于怀者独独是这样一桩大事——“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实实就是满人带着自我临终关怀性质的“天问”。

读着读着，我感到“在他笔端腾跃着的，是急切呼唤民族自尊自强的生命之火”；仿佛又看到，多次在一些小型会议上、或少数挚友聚会时，纪新与他的同胞一起，“切磋一番自己民族的古往今来，说到动情处，热血上涌，眼圈发红”。

正因如此，纪新面对以往文学史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清末民初与伪“满洲国”两大历史时期的满族作家、作品时，是以大量的实证资料，第一次让读者充分了解到，在辛亥鼎革之际满民族底层大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情人格，以及在中华民族危难时满族抗日志士的爱国气节。

他最先介绍说：“暮清时节，在文学艺术界内毅然表达与清廷旧制决裂的满洲名人，则首先当推汪笑侬和英敛之。”接着，又系统举出一系列的旗族报人小说家如蔡友梅、王冷佛、穆儒丐等人，在京城小报上连载的京话小说。对发出“谁教赶上这国破家亡的末运”叹息的穆儒丐，有更为详尽的分析，纪新以人类的良知、民族的自尊，十分沉重地告诉读者：“在当时的北京城里，男人拉车或者去当个街头巡警，女人卖身，这是当时凄惨莫名的旗族困苦家庭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儒丐的社会小说《北京》“对男人拉车的艰难只是一笔带过，而对于八大胡同乃至‘三、四等下处’人间魔窟的真切刻画”，“最令人不堪卒读”。随后，纪新深刻指出：“《北京》提供了一个如此难得的文本，我们姑且以它为标本，来剖析一下这个败得一塌糊涂的民族在落败的当口的思想与作为”，于是，他郑重表示：“满族人从来就极讲究为人的尊严和体面”，“一旦走进民国初年的噩运，他们的尊严跟体面却面临重创，像德三那样的昔日摔跤能手拉了洋车已经感到无颜见人，如秀卿似的清白女子被逼无奈去八大胡同卖笑度日，其感受的人生耻辱就更是无以复加，当读到秀卿以一袭傲骨迎击浊世欺凌却至死不悔……每一位心存良知的读者，却不可能不为旗人女儿这份用生命浇铸的人格自尊和刚烈禀赋而动容。”

后面，当介绍到抗日烽火中的满族作家时，纪新这个东北抗日老革命家的后代，则激情洋溢地叙述了为祖国、为民族而庄严写作的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金剑啸、田赉等一大批优秀的东北满族青年作家，指出：“当‘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发出的最后吼声时，也

成为了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群作家笔下空前一致的主题”。纪新称颂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祖国东北的黑土地上，成长起来了多位满族青年作家。他们秉承自己所珍视的民族节操，用心血用生命，谱写出轰鸣于白山黑水、响彻到神州大地的爱国交响曲，不仅他们的诗文创作业已化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无价珍宝，他们身上与笔下腾跃着的精神理念，也为自己所代表着的那个民族争得了荣光。

.....

可以告慰于祖国母亲并且也可以告慰于本民族先人的是，满族贡献出来了自己齐刷刷的一批优秀作家，在以文学作品为评判依据的大时代考场上，他们提交了优异的答卷。

纪新热爱老舍，敬重老舍，多年来一直尽心研究，力图将老舍作品的巨大价值，最深、最透、最到位地挖掘出来。他最为看重的，是老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作为作家，老舍用沉思的笔，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在引述老舍《正红旗下》所说“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之后，作者说：“老舍热爱自己民族，他敢于拿本民族的历史疮疤给人看，正是作家对民族往昔痛切检讨的证明。”“老舍写《正红旗下》，何尝不是要表达对满族那段特殊历史遭逢的思考。”“他在《正红旗下》里，更具体地检讨了满民族的历史滑落。检讨民族历史，自谴民族劣根，是长久落在民族精英阶层肩头的任务，它对有心寻找出路的民族来说，是件要紧的事。”所以，当谈到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时，纪新对《正红旗下》的评价是：“《正红旗下》的思想、艺术和社会认识价值，是异常厚重的。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老舍晚年文学功力的炉火纯青。它，是老舍艺术和满族新文学的——绝唱”。接着，纪新语重心长，用了这样一句话作结：“哦，‘十七年’间，亏得还有老舍”！

这部书的最后两章，纪新是以乐观、兴奋的心情来书写的。随着国家的民族文化政策的开放，随着中华民族整体包容精神的大幅度拓展，满族历史和现实地位正被重新认识，满族的民族心理越来越明朗舒畅地表露出来，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竞相繁荣的全景视野内，具备优良而厚重文化传统的满民族之文学家们，当仁不让地、豪迈地书写自我，取得一系列令世间目不暇接的成功，纪新称之为“出现了有如‘井喷’现象”。于是，他如数家珍，将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30 多年间在文坛先后出现过的各个年龄层的众多满族作家、作品，一一做了评介，并且满怀深情地说：满族作家们对本民族的爱，有着别样的深沉。他们怀着赤诚的情意，弘扬民族精神中的优质，超越民族性格中的杂质，去完成民族价值观的必要修正。

同样是以大半生精力从事满族文学研究的我，对此书稿前前后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阅读，被它深深吸引着。

对于过去、现在与将来，我坚信该书著作者的如是体验：“一个民族，其价值存在的永恒，无论怎样去看，都将与它相濡以沫的、忧郁歌者的沉重吟哦，互为因果。这也就是满族文学的世纪行吟，继续要和流光溢彩之外的若干冷色相伴相随的道理。”

张菊玲

2011 年 8 月 2 日，于京西蓝旗营

自序

检读满族书面文学进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有那么两个颇重要的特征，在这部族别文学史册上一直体现着相辅相成的存在：其一曰“流”，其二曰“变”。没有自己特别的“流”，或者没有自己特别的“变”，满族文学个性化的历史都将不复存在，自然也就不能谈及满族文学对祖国及人类文化的奉献。这，是笔者多年来治满族文学学术的基本心得之一，也是之所以要将这部书稿题目确定为《满族书面文学流变》的因由。

20 世纪前期，满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命运出现了大转折。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摧毁了清政权，终止了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意义。不过，这场革命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也随即反映出来，不单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性质未能随着政权鼎革获得质的改变，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做过诸多积极贡献的满洲民族，亦在一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下，被通盘否定。在民族歧视情绪风行于世间的过程中，满族承受着在舆论上与生存上为后世难以想象的双重挤压，整个民族险些从人们的视野当中被抹掉，他们的文化遭到人为的忽略与遮蔽，便是极自然的结果。

20 世纪后半叶，新型国家体制破天荒地重视起国内不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在各个兄弟民族纷纷发掘、梳理民族传统并在新的基点上将之引向繁荣的形势鼓动下，满族自身有价值文化的拯救、甄别、阐发、彰扬，也被推上日程。

然而，满族作为一个有过特殊历史遭际的民族，其文化传统的重见天日，远不是一件说说就能办到的事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们重新谈起“满族文化”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因为与人们的久违，已经教世间感觉陌生和茫然。满族还存在吗？满族文化还存在吗？除了彻底地“汉化”而外，满族文化还有其说得出来的特点与价值吗？再耗费艰辛去寻觅那逝去的满族文化韵律还有现实意义吗？——统

统都是教大家备感疑惑的地方。还有，毋庸讳言，由于世间对满族这个民族的矮化、丑化乃至妖魔化的时日较久，从都市到乡间，满族文化被视为“封建文化”、“腐朽文化”、“反动文化”，一任反复荡涤，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当搜集研究者走入满族的群体、民间以及世家，展开自己工作的当口儿，所接触对象们因心有余悸，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是谈“满”色变者，远非个别；同时，可以估算到的本该保有满族文化及文学资料的场所，多曾遭到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劫，种种史料烟消云散的情形亦不难想象。

是的，满族文化传统被遮蔽、被误读久矣。再去讨问其历史责任已经不可能并且无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凭借我们的努力，比较真切比较科学地重新复原传统、阐释传统，让传统在今日之社会文化生活中体现其自身价值。

无疑，这是一条修远、曲折、坎坷密布的路。

将近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经过为数并不太多却差不多是整整一代学人的戮力探求，满族文化这一在很长时期内为世人难解其详的传统事相，再度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了它的原来轮廓。

笔者身为“满族文化—满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长期从业者，理所当然地应为时下本领域的诸多成果而感到快慰。

单就满族文学而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二十本专著和数百篇专论，以显示出身后的研究业绩。满族文学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其潜在的价值正越来越确切地被凸显出来。30年前那种怀疑抑或忧虑满族文学研究有否意义的说辞，现在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随处可闻了。

可是，在充分认定这一领域系列成就的同时，还是没有理由将乐观放大。相对于满族先民及其作家们所留下的大笔口承的尤其是书面的作品，已有的研究也许还仅仅是让那冰山的一角刚刚浮出水面。在问世的研究专著与学术论文当中，严格地讲，切中满族文化个性规律、弘扬满族文学独特张力的高妙论述，毕竟仍只是凤毛麟角。今日的满族文学研究既然已经迈过了起步阶段，就应当更有效地超越以皮毛式的展陈演示，来泛泛地壮声势护门面的无谓程序，真正走上理解满民族审美追求、贴近满民族文化心音、释放满民族精神律动的道路。

虽说是满族文学的研究已经起飞，事实上，我们也还时常感到，一些最初就伴随着这项研究而生的基本问题，一直在如影随形地跟随着研究者。例如，满族的绝大多数作家文学作品都不是用满文而是用汉文写就，只此一点，就足以让满族文学怀疑论者继续无休止又振振有词地说下来。这几乎成

了满族早就彻底“汉化”的确凿证据，成了类似“魔咒”一般束缚满族文学研究长足发展的障碍。于是，进一步的推理也便形成：既然语言运用上没有了民族自我，还研究它做什么呢？——换句话说，满族文学研究，俨然是一门“伪”学术。

是了，要想把满族文学真的从社会历史的重重遮蔽跟民族文化的深深误读之中搭救出来，眼下可能仍然还处在一个需要“迈步从头越”的新起点。我们离那庆功奏凯的时刻还远得很。

学术研讨，在不少情况下是可以见仁见智、多元并行的。观察和诠释同一事物，也是可以启用不同视角的。笔者选择“流”与“变”这两把钥匙，来开启这方上下几百年整合而成的满族文学“黑匣子”，得失成败，亦未可知。

在我看来，任何在人类文学史册上面成功的、为人们推崇的族别文学，都不能不是“流”和“变”二者的完美结合：“流”是指的它脉络清晰与自成一格，成就为或者接近成就为特殊民族的特殊文学流派；而“变”，则是指的它敢于探索创造，善于标新立异，在永不知足的流脉变通中随时涌现有价值的新生长点。

发轫于17世纪初期的满族书面文学，在我看来，恰恰兼具着这样的两个特点。而一旦确认了这样两个特点的存在，有别于他民族文学的满族文学的存在，便是符合逻辑和可以给予正面判断的。

这部奉献给学界师友们的书稿，是我对于这一谈不上“发现”的发现，一些不很成型的解说。

既然已经不揣冒昧地把书稿写了出来，也罢，那就再不揣冒昧地写上一篇“自序”。

真心等待着的，是师友及读者的批评。

本书作者 谨陈

2011年5月1日

目 录

序	张菊玲 (1)
自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扁舟孤进——母语文学之检讨	(20)
第二章 借海扬帆——汉文书写始肇端	(41)
第三章 朔方气跃——民族诗魂渐铸就	(66)
第四章 群峰耸峙——激荡文澜尤此时	(98)
第五章 文言浮绘——疾飞双矢竞穿鹄	(129)
第六章 经典复读——红楼梦醒托大荒	(153)
第七章 阡陌旅痕——云卷云舒临万象	(182)
第八章 斜晖落鹭——陆离世相应时文	(223)
第九章 清民交割——弄潮歌畔闻叹惋	(272)
第十章 民国情状——忧患启蒙伴救亡	(312)
第十一章 共和初闾——百部并腔绝唱寡	(366)
第十二章 世纪途次——为霞满天纵歌吟 (上)	(401)
第十三章 世纪途次——为霞满天纵歌吟 (下)	(452)
跋	(480)
后记	(486)

引 言

这本书所要讨论的，是满族书面文学的流变问题。因为涉及满族作家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所以也会带有些许的文学史性质。

依笔者蠡测，满族及其文化、文学，大约是广大读者普遍觉得有所接触而实则相当陌生的事物。故而，在本书正文的前面，还是有必要将有关的背景资料作些简要交代。

在目前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内，满族，是一个既十分古老又异常年轻的民族。说它古老，自非妄谈，有关它的先民生息活动的确切记录，早在中原先秦时代的文献当中即已出现；而说它年轻，也是实言，它的确切“问世”是有史料可鉴的，是有具体日期可以认定的——这跟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民族已难考其形成之日的情形迥然有别——那就是明朝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的农历十月十三，后金政权大汗（亦即随后不久改国号“金”为“清”的皇帝）皇太极通过颁发谕旨，正式废止旧时“女真”（又译为“诸申”）族称，将本民族的族名定为“满洲”。

就民族学界的认定，满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其先民是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中的一部分。远在我国中原地区的舜、禹时代，满族的初民肃慎人，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生活在祖国东北松花江以东至牡丹江流域的广袤地域。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汉文典籍《左传》中，曾有关于“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证实了满族初民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着联系。随后的肃慎后裔、满族先民，又曾以挹娄（秦汉时期）、勿吉（南北朝时期）、靺鞨（隋唐时期）和女真（宋金元明时期）等称谓见于世。

在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靺鞨族的粟末部融白山部及高丽遗民，曾经在今吉林一带建立国力颇强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经济文化直追中原同时代的盛唐。到了公元12世纪初，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朝，

又曾立国一百二十余年，与南宋、西夏在中国版图上鼎足而三，其疆域东北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今蒙古国，西与河套、陕西横山和甘肃东部与西夏接壤，南边以秦岭、淮河与南宋交界。在金世宗和金章宗在位时期，其辖域内还呈现过为史乘所夸赞的盛世景象。

作为肃慎后裔至满族先民的民族成分，其历史性地展开，有些复杂变数，或者换句话说，并不是“一线单传”的。“渤海国”解体后，粟末靺鞨人失散，有的进入朝鲜半岛，离开了女真群体。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原来并不发达的黑水靺鞨，则成了日后金代女真群体的基准先民。及至金代被元朝瓦解后，已经进入中原的金代女真人也多数分散于关内的冀鲁豫广大地区，融合到了当地的汉民族中间，真正返回东北故乡的并不多。

而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则又是后来重新再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的、先前发展更其滞后的女真群体，他们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

虽说“渤海国”的靺鞨人和金代的女真人都未成为满族的直系祖先，但是“渤海国”和金代由肃慎的不同族裔成分所留下的令人炫目的经济文化史实，却从另一个角度，证实着一个潜在的历史逻辑：白山黑水间肃慎古族的流脉所具备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不容忽视。历史上一切有作为的民族，尤其是其中一些中小民族，他们要在大民族的历史威慑与制约下，都不外乎是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力的高度结合。历史机遇一旦出现，能否抓住，是民族主观能力的集中显示。这种主观能力，既包括族群自身力量的充分蓄势，也包括着族群领袖人物对于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予以及时捕捉掌控。因此，假如说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期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已经为肃慎古族的另一流脉亦即明末女真—满洲，在中华封建历史的末叶横空出世，再造出一段东方帝国的辉煌，埋下了伏笔，也许就不为过分了。这一东北亚地区的古老族群，一向富有创造力和自决精神，果敢粗犷勇于承当，又具有非凡的文化想象力和实践精神，他们在并不多得的相似历史境况下，完成着一浪高于一浪的进取和成功，内里想必存在着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新崛起的女真人，分批先后南下，形成了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女真三大部。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争雄，战乱不已彼此残杀，民众蒙受极大痛苦。15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首领努尔哈赤，兴兵举事，顺应历史趋势及民心所向，肩负起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此后，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下，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建州女真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了邻近的蒙古和